

一、香港民主運動始於何時？

「愛國左派」(指親中共的香港組織)喜把香港民主運動追溯至1925年「省港大罷工」。但對大部份善忘的香港人來說，那有如史前時代。

在1978年大陸搞「改革開放」之前，在「愛國左派」眼中，「香港民主運動」必然是「反資反殖」(正確是，必須是「反資反殖」才配稱民主運動)，屬中共「民族解放運動」範圍。「改革開放」打破了這個規範。尤其在1984年「中英聯合聲明」簽署後，「愛國左派」的方針是配合未來北京對港的管治，而不論其政治內容。因此，之後誰再說「反資反殖」，便等同於破壞「一國兩制、安定繁榮」，等同於「反革命」。儘管一些「老工聯」(「工聯會」，指「香港工會聯合會」)亦會談及1967年的「反英抗暴」運動(港人一般稱為「左派暴動」)，但運動失敗，加以暴力手法丟失民心，其後已甚少被「愛國左派」定性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¹，這段歷史塵封在舊檔案內。

對「愛國左派」來說，「香港民主運動」難以拿口(說完全反對太令人尷尬，說支持則容易誤中雷區)。幸好迎來「九七回歸」，「香港民主運動」幾隻字對「愛國左派」來說，又綻放出新的含意：就是協助中央在香港進行「循序漸進」的「民主改革」。反過來說，就是抵制「民主派」及市民急進的民主訴求。為了做好這個工作，在回歸前五年，預備好管治香港的最大「愛國左派」政黨「民建聯」宣佈成立，它的全寫是「"民主"建港協進聯盟」。(引號為筆者所加)

倒是香港的民間組織及「左翼」份子(不是指「愛國左派」)²

愛抓著「1967」辮子不放，常以「67」作為自己開場白。「67」後，「愛國左派」收縮，香港「左翼」及民間組織有了更大活動空間。殖民地政府亦改用懷柔吸納政策，興辦社會福利，一些外國教會亦乘時進入香港，支持傳統左(親中共)右(親國民黨)兩翼以外的民間/基層力量。像1968年成立的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」(七十年代起成為香港最活躍的勞工團體，它在1990年協助「工盟」成立，即「香港職工會聯盟」，後者是香港第二大工會聯盟，也是最大工會聯盟「工聯會」的對手)、1971年成立的「社區組織協會」(活躍至今，它在1983年協助「公屋評議會」成立，後者是八十年代香港公屋居民運動的主要推動者。「公屋評議會」的領導權在回歸後才為「愛國左派」的「港九新界公共屋邨居民商戶團體聯會」取代)、1973年成立的「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」(由於進取的抗爭手法，於1997年在受壓下解散)。

七十年代，被稱為香港的

「火紅年代」。1968年有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³

、1971年保衛釣魚台運動⁴、1973年反貪污運動⁵、1977年艇戶事件⁶

、1978年金禧事件⁷等。而七十年代，亦是香港經濟「起飛」的年代，除輕工業外

(曾乘韓戰、越戰而發展)，服務業亦急速擴張，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介入社會服務，並大規模興建公共房屋。這個時期，新型工會興起，有別意識形態上親北京或台北的傳統產業工會，他們很快便團結在以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」為首的獨立工會旗下(獨立指不偏北京不偏台北)，像1973年成立的「教育專業人員協會」、1978年的「公務員工會聯合會」、1980年的「社會工作者總工會」。另外，1975年<70>⁸

成員吳仲賢從法國回港，創立「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」，托派開始活躍香港社運。

雖然不少「民主派」⁹

元老亦出身於這個時期的「左翼」及民間組織，但香港「民主派」正式出場卻要遲幾年，即1985年出現首次全港地區性區議會選舉後。這場由殖民地政府主持的「民主化」計劃，像其後1991年首次立法局選舉一樣，藉此培育本地中產階級，使成為牽制「愛國左派」的主要力量。「民主派」由是登場。

1989年中共血腥鎮壓北京學運，打亂各方原先部署。香港百萬市民上街，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」（「支聯會」）成立。香港人的熱情史無前例，媲美省港大罷工。自1984年簽署「中英聯合聲明」以來，香港人面向九七回歸的焦慮不安，一下子爆發出來。

1995年，尚餘不足兩年的殖民地政府再次推行「民主改革」，修改立法局功能組別選舉辦法，擴大投票人數，讓當時的「民主黨」（建立於1994年）成為立法局第一大黨。結果，換來中共在回歸時解散立法局，換上自己的支持者。要到1998年，「民主派」才再透過選舉重返立法會（立法局已改名立法會）

。「97回歸」後，「支聯會」與「民主派」成為政治上最重要的反對派。然而2003年7月1日（香港特區回歸日）爆發「反23條立法」示威¹⁰，五十萬市民上街，香港政治版圖又重新洗牌。

新的政治形勢催生新的政治力量，像2006年成立的激進中產「公民黨」、及基層左翼的「社會民主連線」（「社民連」，其後又在2011年分出「人民力量」、2012「熱血公民」）。後三者採用民粹式抗爭，並不斷狙擊「民主黨」及「民協」（「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」，1986年成立）等傳統溫和「民主派」，有時為了狙擊他們，甚至放生「愛國左派」及工商界政黨。從八十年代以降，大體團結的「泛民」（泛民主派）步入分裂。民粹主義批評走溫和及議會路線的「泛民」未能保衛香港民主，令香港平白浪費三十年。

「03.71」催生了「民間人權陣線」（「民陣」）。自此，「6.4」和「7.1」成為香港人重要的日子。每年的「6.4維園集會」由「支聯會」舉辦，「7.1遊行」由「民陣」負責，代表了香港人對民主的兩大訴求（前者有關中國，後者有關香港）。「03.71」的另一個結果是大量市民自發參與社會運動，尤其是年青人，他們並無興趣加入傳統政治組織（無論是「民主派」或社運組織），自我標榜「八十後」（出生於八十年代，故多是廿多歲的青年學生）。他們與學院有較多聯系，能建立較完整論述。「八十後」批評過去三十年民主運動失敗，標榜新一代社運出現，得到學院派知識份子認同（「三十年」如何算，一直未有清楚界定。大概從1984年「中英聯合聲明」簽署起計，至2013年「7.1」剛好三十年）。「03.71」後，多個大型社會行動都與傳統「民主派」及社運團體沒有很大

關係，甚致有意與政黨保持

距離，像2006年抗議天星及皇后碼頭清拆¹¹、2012年「反國教」¹²

、2013年抗議香港電視不獲發牌¹³

，最後是2014年的「雨傘革命」，每次都能夠聚集群眾，而年輕人亦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。

一個新時代是否已經開始？如是，要告別的又是甚麼？又或者，對舊一輪的民主運動何時開始、何時結束，應有個說法。但又能怎樣回答呢？

二、三十年過去(1984-2015)

過去三十年是如何發生？這種全景式探究留待學者研究，我只能回顧我是如何走過這三十年。路是由人走出來的，我是人群中的一個。這群人叫「街工」（「街坊工友服務處」）。

「街工」是一個基層勞工團體，成立於1985年，今年剛好三十歲。1985年，是首次有全港性區議會選舉的一年（1982年觀塘區議會選舉是試驗性質），也是香港「民主派」誕生之年。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，「街工」只屬「民主派」邊緣份子，這與他的出生有關。

1976年，即後來被稱為「火紅年代」的某一天，一個小團體在荃灣落腳。荃灣是新發展區，也是香港重要的工業區。一批大專學生，有些剛畢業，有些還未畢業，他們受各種左翼思想薰陶，有「托洛茨基主義」、「毛澤東思想」、「無政府主義」、「解放神學」，很混雜，也有些沒有政治取向，只希望接觸工人、服務工人。他們成立一所工人夜校，叫：「新青學社」。

這時，政府推行免費教育至小學，中學還需自費，所以許多年輕人小學畢業到工廠打工，工餘到補習社進修。「新青學社」看準這個需要，以教育來組織工人。學社的課外活動是組織學員參與社會行動，如1977年的艇戶事件、1978年的金禧事件。1978年，一個香港出生，剛從英國留學回來的青年加入，成為三個負責人之一

（另一個是

劉山青，他不久後跑

到北京串連民運份子，被中共判監十年）

。這人叫梁耀忠¹⁴

，出身「愛國工會」家庭，在英國半工讀，參與華人社區權益運動，認識了一個香港去的托洛茨基主義者。與劉山青一樣，梁回港後與1975年成立的「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」有聯繫，這是後來「街工」被「民主派」排斥的一個原因。1985年，知道政府將進行全港性區議會選舉，學社推舉梁參選。這時，由於政府推行初中免費教育，越來越少工人來學社，大家正苦思對策。

梁耀忠選擇到「葵涌中」參選，是因為這是一個毗連荃灣的工業區，更加重要是這裡也是工人住宅區。葵涌是個大山頭，七十年代政府發展葵涌，在山上及山腳蓋了多座公共屋邨，「葵涌中」位處山腳。公共房屋由政府撥地興建，廉價租給低收入家庭，它的人口密度高，一兩條公共屋邨便可民選一個區議員。結果梁高票當選。

梁的選舉策略正確，他逐家逐戶拜訪居民，瞭解他們需要，鼓勵街坊一齊爭取。梁發現許多居民投訴房屋石屎剝落，在梁及記者追查下，最後發覺興建時採用鹹水導致鋼根生鏽（七十年代正值水旱期，且貪污嚴重）。其後政府在輿論壓力下被迫進行調查，發現全香港共有廿六幢公屋有倒塌危險，需盡快清拆，另五百幢需維修，影響超過五十萬人。這是後話。

梁耀忠當選後與助選團（包括部分「新青學社」成員）成立「街工」。「新青學社」念念不忘的是組織工人。「葵涌中」一邊是公共屋邨，另一邊是工廠，這是七十年代新市鎮的模式。政府在交通不便的市郊起公屋，然後把基層市民安置在此，再在路旁蓋工廠，令屋邨居民可接受廉價工資在本區工作。香港的輕工業由此起飛。「街工」每天到工廠區宣傳勞工權益，此時大陸「開放改革」如火如荼，不少生產線開始搬往大陸。由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，透過不斷的工潮介入¹⁵，「街工」建立起其勞工團體形象，而不只是一個地區的議員辦事處。

「街工」成立於1985年，此年正是「中英聯合聲明」後一年，距離香港「回歸」只有十二年，社會焦點轉向政治。殖民地政府在1985年推行區議會選舉只是第一步，立法局選舉是第二步。此時，香港市民要求在1988年推行立法局民主選舉，香港「民主派」亦形成。而「愛國左派」則動員一切力量阻撓民主化進程，親北京的「工聯會」提出「要飯票，不要選票」。結果，英國向中方妥協，「八八直選」運動以失敗告終，換來是政府答應在1991年推行立法局半吊子民主選舉，除保留委任議席外，再將餘下一半席位留給「小圈子選舉」及傾向商界的「功能組別」，只有一半留給直選。1991年，「街工」派梁耀忠參選立法局失敗，引致內部路線之爭（爭論的題目：「是民間，還是議會？」）「街工」一半會員退會，元氣大傷。

然而1989年支援中國民主運動改變了香港社運的生態，自親台的「右派」淡出香港政治，香港人已甚少公開批評，更遑論介入中國事務(香港托派例外)，但「89.64」扭轉了這種冷淡。自1988年起，「街工」積極參與支援中國民主運動(是時，大部分「民主派」仍避談中國政治，這時劉山青仍囚禁在大陸)，梁耀忠成為新政治組織「四五行動」一個負責人(因政見不同，一年後退出)，他在「89.64」後亦成為「支聯會」常委至今。北京六月的鎮壓激起香港人義憤，很多從不關心政治的市民從此投身運動。

「89.64」亦改變了西方對中國的態度，英國積極部署在1997年回歸前在殖民地推動另一輪「民主化」。殖民地政府修改立法局選舉方法，將原本以職業劃分，只容少數人投票的「功能組別」改為業內從業員一人一票，結果「民主派」大勝，梁耀忠亦循功能組別於1995年晉身立法局。殖民地「民主化」及九七迫近催生政黨政治，代表「愛國左派」的「民建聯」(1992)、工商界的「自由黨」(1993)、中產民主的「民主黨」(1994)相繼成立。梁耀忠除短暫加入小組組織「前線」外，「街工」一直未加入任何政黨，極力保持其獨立路線。

最能反映「街工」在「泛民」中獨立位置是2010年的「五區公投」運動。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香港2012年實行雙普選，但答允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，2020年普選全部立法會議員。但與此同時，又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經「少圈子」組成的「提名委員會」提名。2009年，被譽為「激進民主派」的「社民連」及「公民黨」發起「五區公投」，全港五區各有一名立法會議員辭職再補選，補選以「盡快實現真普選、廢除功能組別」作口號，使成為一次「變相公投」，結果辭職議員全部再次當選。但公投結果並未改變北京態度。政府轉游說「溫和民主派」的「民主黨」及「民協」。

其後政府建議在2012年增加10個立法會議席，當中五席交由地區直選，五席交給功能組別。「民主黨」提出改良方案，建議除新增五個議席由直選產生外，原交給功能組別的五席亦改為全港一人一票選出。由於得到「民主黨」支持，政府議案獲得通過。此事令「泛民」分裂成兩大陣營。然而「街工」認為，「五區公投」不能達到真正公投作用，故未有參加。同時亦認為，「民主黨」的改良方案過於妥協，故亦未支持。2011年「工黨」成立。它由「工盟」核心成員及一些無黨派「泛民」議員組成。「街工」雖然一直與「工盟」友好，但「街工」會員大會否決了梁耀忠及「街工」加入「工黨」，寧保持自己獨立路線。

「街工」在香港社會運動上非常活躍，但不屬「話事」團體，只默默耕耘。它會就自己認同的議題參與聯合行動，平時集中地區的基層及勞工工作。由三十年前一個區議員、一個職員、一個丁點大的辦事處，發展至四個區議會議席、一個立法會議席、六十個幹事、十二個地區中心。

儘管「街工」與「工盟」都是勞工團體，「工盟」由近百個工會組成，會員超過十萬；「街工」只有七十個會員(另六十個幹事)。從人數看，「街工」更似一個小型政黨，但它界定自己是個勞工團體，容許會員同時加入其它團體及政黨。它有時被批評為過於穩重/保守，過於重視一般街坊及工友的意見(包括街坊及工友的保守意見)，但「街工」同時又有一份儘管已經褪色的--左翼立場。像近年中港融合，不少港人對大陸新移民及遊客產生抗拒，一些「泛民」團體亦發出排外聲音。但「街工」拒絕這樣做，認為大部份新移民與香港工人一樣，同是全球化下被剝削的一群。「街工」經常受到一些街坊指責，但「街工」沒有放棄。「街工」有一個規模不小的新移民婦女組，在「風頭火勢」時，它會低調工作；形勢好轉時，就主動出擊。

然而，近十年香港社會日趨撕裂(原因包括「03.71」後中央加強對香港控制、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觸發矛盾、「泛民」分裂...)，社會及政治矛盾不斷爆發，必然衝擊「街工」內部及其未來發展。三十年過了，未來，在何方？

三、未來？

政改爭論毫無疑問是目前最具爭議的題目，籌備經年的「佔領中環運動」(「佔中」)遲遲不發，結果學界(「學聯」¹⁶及「學民思潮」¹⁷)佔領「公民廣場」在9.26搶開出擊，之後「佔中」才在9.28倉猝登場。催淚彈及警棍令幾拾萬市民上街，「雨傘革命」遍地開花。然而狂瀾之下，是香港社會結構早已滑坡，民怨沸騰，中產不滿，青年及學生浮燥，工人就業不穩...

作為勞工團體，最能感受是工人就業的變化。八十年代廠區滿街可見一部部搭載年輕電子女工的廠車；九十年代已是三、四十歲售貨員，雖然百業興旺，金(融)股(票)齊鳴，其實種下禍根；回歸後碰上亞洲金融危機、沙士疫症；二千年之後，來「街工」已多中年保安、管理員大叔、大嬸。現在，接觸更多是不論年紀的零散工人。沒有全職工作，不斷輪替於長工、散工、失業救濟之中，工會一時之間，不知如何組織¹⁸。不單是一間工廠幾百工人罷工難見，八十年代聲勢浩大的公屋居民運動同樣難覓；反倒是市區的舊區重建¹⁹、郊區清拆²⁰，還有環境保育²¹，譜成新都市運動的戰場。如果說，八十年代「街工」選了葵涌作基地，奠下日後基礎。今天，戰場似已遠離「街工」，餘下只有齷齪地區工作、老人問題？將如何吸引新一代青年活躍份子？真是這樣？

「街工」堅持「左翼」的階級思考。2003年「7.1」，當大眾傳媒及學者吹捧「反對廿三條立法運動」為一起中產階級運動時，「街工」等基層團體力排眾議，認為民眾的不滿，早聚積在「亞洲金融危機」時期香港政府新自由主義的「劫貧濟富」政策內。「反廿三」只是濫觴，2007年長達36日紮鐵工潮²²、2013年40日的貨櫃碼頭罷工²³，均反映階級矛盾日趨激烈。所謂「中產反叛」，實際反映全球化危機下，社會中下層(包括日趨向下流動的中產階級及就業不穩定的廣大基層)的不滿。而「九七回歸」不特是一項政權更替，更是「商人治港」的正式確立。2012年第四屆「特別行政區首長」選舉，由代表港英時代資本家利益的唐英年，與代表「愛國左派」商家利益的梁振英，作割喉式爭奪，反映全球化危機下，尤其是中國市場開放後，資本財團在香港的角力與重新洗牌。

儘管2013年「7.1」後的「八十後運動」，提出「三十年鬥爭模式」過時論，高揚新型社會運動不依賴深耕細作、不需扎根社區，重要是民粹式、無組織網絡動員，而且也無視「傳統」的階級分析。但「愛國左派」並不這樣看。今天，在「雨傘運動」仍在僵持之際，「愛國左派」同樣動員，只是不動聲色。他們掌握小市民怕亂心理²⁴(那些反對「佔中」者，不少是小店主、低級公務員、小白領、司機、中下層專業人士、稍微有點積蓄的退休長者，這些人在社會動盪中最易「傾家蕩產」，化一生積蓄為烏有。其實都是殷實街坊)，潛行社區，動員廣泛的保守力量，以迎戰來年區議會選舉，及後年的立法會選舉，釜底抽薪。

福無重至，一些「佔中」的年輕朋友，延續「八十後」立場²⁵，揚言杯葛未來選舉(他們並非向「愛國左派」而是向「民主派」潛在支持者呼吁)，好讓社會運動「重上正軌，離開議會、返回街頭」。在左右夾擊下，「民主派」重挫可期？幸好「街工」不是「泛民」核心，長期以來都走自己勞工路線，紮根社區，這是它能以螳臂抵抗「愛國左派」及其它「泛民」競爭者三十年的唯一資源。然而，若一旦抽離社區轉打運動戰，首先崩盤的恐怕不是「泛民」。在社會矛盾日趨尖銳下，「街工」內部同樣陷入不斷爭拗，年青一代躍躍欲試、打破常規。

對「傳統政治」模式的批判令人想起1968年巴黎學生運動，它曾經是七十年代香港「左翼」的精神食糧。學生的行動與魄力足夠掀起數百萬工人罷工，威力蓋過法國「傳統」的政黨及工

會。但學運結果卻是右翼政府在選舉中連任(並非香港小圈子選特首，而是透過香港人夢寐以求的「真」普選)。這也許可解釋為學生的抗爭促使保守市民即時反彈。但十多年後，即曾受六十年代學運洗禮如今已成為社會中堅的當年學生，在七、八十年代已擁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時，新自由主義卻得到授權上台(戴卓爾及列根)。

是，許多人變節了，當年大家都真誠。但也不是所有六十年代學運參與者都把當年的理想忘掉，恰好相反，那種經歷，卻令他們認為，民主派及左翼政黨都不足信任，有組織的工人及民眾亦同樣可疑。許多人決定不再投票，他們寧嚮往另類政治、另類生活。拱手將政治送給右派。

1991年「街工」的那場分裂(「是民間，還是議會?」)，我屬反對議會路線的一派，之後和一些人分裂出去。有一個很長的時間，我和一些「民間社會派」²⁶的朋友認為，自91年立法局舉選後，政黨及議員便將民間力量吸乾，使社會運動一蹶不振。經過十年思考，我的看法是，香港社會運動衰落，是被香港前途問題壓碎(民間團體都無力面對)，而政黨及民間運動之分裂，則造成了「二者相輸」局面。從這個意義說，「街工」代表了一種另類。

「街工」微不足道，但它代表了一群人。這群人無論年紀多大、或多小，都仿佛剛從八十年代冒出來，還散發著七十年代火紅歲月的餘溫，並且，都帶著對特有工人運動理想的堅持。

作者夏菽現職「街坊工友服務處」

註解

- 1.1967年「反英抗暴」運動源於當年人造花廠工潮，警方逮捕工人引發香港「左派」工會全面介入，最後演變成流血鎮壓，事件中，共有五十多人死亡、八百多人受傷，近二千人被檢控，「左派」工會受嚴重挫敗。但最致命一擊來自1978年中共公開對1967年「反英抗暴」的否定。
- 2.指不隸屬北京直接指揮或影響，擁有左翼意識形態的小團體，當中包括獨立的「毛派」、「托派」、「社會派」、「新左派」等。
- 3.香港自英國佔領以來，一直以英文作合法語言。1968年大學生發起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，至1974年政府始接受中文的合法定位。
- 4.1970年美國打算將二次大戰佔據的釣魚台交給日本，美加的港台學生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。1971年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」舉行維園集會，受政府暴力鎮壓。是為第一次保釣運動。
- 5.香港早期貪污嚴重，1973年涉嫌貪污的外籍總警司葛柏潛逃英國，一批青年及學生發起集會抗議被鎮壓，結果十二人被捕。殖民地政府於1974年宣告成立專責反貪的「廉政公署」。1975年葛柏終被引渡回港，監禁兩年。
- 6.七十年代香港仍有數萬居民居於艇上(艇戶)，環境惡劣，時有小孩溺斃。油麻地避風塘有幾千戶艇戶受颶風影響，要求政府安置陸上。1979年，一批艇戶及支持者乘旅遊車往請願途中，在旅遊車上被拘捕，被控「非法集會」。

7.德蘭中學校長被老師投訴貪污落台，新任校長與得到學生支持的老師關係惡化，校長威脅解僱老師，觸發學生罷課。1978年5月，政府宣佈關閉學校，引起社會人士反響，舉辦萬人集會支持罷課師生。最後，政府宣佈開辦五育中學接收師生，事件結束。

8.1969年發生珠海事件，數名就讀珠海書院的學生因反對學校操縱學生會而被開除學籍。其中兩名學生莫昭如及吳仲賢創辦了〈70〉雜誌，之後〈70〉成為香港青年激進運動的旗手。莫昭如主張無政府主義，吳仲賢後來成為托洛斯基主義者。

9.「民主派」是個泛稱，而不是一個黨派。譬如1986年的「高山大會」便有百多個爭取普選的團體出席。

10.香港特別行政區《基本法》規定香港自行立法禁止叛國、分裂國家、煽動叛亂或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。2002年政府啟動立法程序，引起香港人不安，五十萬人上街抗議，最後立法被擱置。

11.2006年政府宣佈天星及皇后兩個碼頭會在填海工程中被清拆，2006年12月示威者佔據天星，被警逐一拘捕。2007年4月，示威者在皇后碼頭紮營駐守，3個月後警方清場，碼頭被拆卸。

12.2012年9月，教育局宣佈在小學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，簡稱「國教科」，引起社會關注，批評者指如同向小學生「洗腦」。中學生組織「學民思潮」成立，聯同各界舉行反國教行動，十二萬市民響應包圍政府總部。結果政府撤回有關建議。

13.政府打算增加免費電視台，2013年10月兩間電視公司獲發新牌，但政府未能解釋香港電視網絡不獲發牌原因，引起社會不滿，超過十萬市民上街示威。

14.有關梁耀忠，可參考他本人自傳式著作《我固執而持久地，過這種生活》(香港：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，2010)。

15.八十年代「街工」介入的工潮主要有日資的亞洲精工錶廠工潮(1986)、荷資的飛利浦電子廠工潮(1988)、美資的飛達電子廠工潮(1988)。其中，亞洲精工錶廠工潮，200名女工佔領廠房十三日，並獲國際工會支持，發動全球杯葛行動。

16.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」，成立於1958年，成員包括八間大學學生會。

17.中學生組織，成立於2011年「反國教運動」中。

18.「街工」與「工盟」不同，「工盟」走的是全港性行業工會路線，以組織工會作重點；「街工」則在社區組織零散工人，這些工人就業及行業都不穩定，很少加入工會，更為弱勢。

19.如2004年反對灣仔利東街舊區重建的行動、2009年反對長沙灣順寧道舊區重建的行動。這些事件既涉及弱勢者權益、反地產霸權，亦牽引本土生活方式在商業大潮淹沒的不滿。

20.如2008年反對借興建港深(香港-深圳)高速鐵路而對菜園村進行的清拆行動、2012年起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連串抗爭。兩宗事件，亦涉及港人對中港融合的恐懼。

21.如2004年「保護維港運動」，反對不斷在維多利亞港填海、2010年反對「港珠澳大橋」未符合環境影響評估而動工。兩宗事件，民間都利用司法程序有效拖延了工程。

22.香港回歸後經歷亞洲金融風暴、沙士疫症，工人工資不斷下降。2007年香港經濟復甦，但工資卻未有調整，紮鐵工人要求工資恢復至十年前水平，罷工36日。工潮由「工盟」屬下工會領導，得到市民廣泛支持。

23.與紮鐵工人相似，碼頭工人的工資較回歸前低13%，工作環境惡劣，不少要輪班24小時。在「工盟」屬下工會發動下，罷工得到市民熱烈支持，反映對香港貧富懸殊、地產霸權橫行的不滿(貨櫃碼頭業與紮鐵工所屬的建造業，均與地產財團息息相關)。工潮另一特色是大專學生積極介入。

24.在一些社會學研究中稱這個階層為「中產下層」(lower middle class)。他們喜自稱「平民」，或「夾心階層」。作為一個人數龐大卻鬆散的社會階層，他們沒有像「中上層中產階級」般推翻封建皇權、打下資本主義江山的威風。也沒有像工人階級推動革命，令資本家聞風色變的霸氣。他們倒像馬克思在《路易·波拿帕的霧月十八》形容的小農階級，「不能代表自己，要由別人代表」。「中產下層」文化並不高雅，但有基礎學識，關心子女，是城市社區脈動的樞紐，歐洲市鎮自封建以來即已如此。城市的統治者善用他們，用香港例子，是各類公益籌款、清潔減罪，平息民變的別動隊；業主法團、諮詢委員是其社交場合。小店主，人脈廣泛，公務員，與民政處沆瀣一氣。不過，他們亦不滿政府與財團地產虎狼為奸，也不滿福利主義「偏幫」窮人，自覺是夾心階層。他們最恐懼是社會動盪--因他們的命運最為脆弱。因此往往支持有勢力者，回復社會秩序，成為法西斯主義或極右信徒。

25.儘管部份「雨傘運動」的年輕活躍份子繼承著「03.71」的「八十後」命題，強調「三十年民主運動模式過時」，及非組織化網絡動員的重要。但新一代活躍份子(不少是「本土派」)卻批評「八十後」是「左膠」(僵化的左翼份子)，指責他們是政府「內奸」，潛入運動、分化運動、勸人撤退。被點名批評的「左膠」份子幾乎被指分佈在所有主要的學生、「泛民」、民間組織內。在「雨傘運動」的三個「佔領區」內(金鐘、旺角、銅鑼灣)，均貼滿這樣「獵巫」、「捉鬼」海報。

26.「民間社會派」是指一班環繞〈民間抗爭報〉的朋友。〈民間抗爭報〉成立於1990年，正值首屆立法局選舉前。「民間派」是社運人士對他們的稱呼，當時台灣的民間社會理論對香港的「民間社會派」有一定影響。